

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宣传动员

胡靖¹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的卫生观念十分淡漠、落后。部分群众不注重清洁卫生，尤其不注重公共卫生，缺乏必要的科学卫生知识，封建迷信思想盛行，还有的群众认为卫生与生产有矛盾，单纯强调客观困难。为此，党和政府利用报刊、标语、板报、墙报、会议、讲座、广播、图画、展览会、幻灯片和文艺节目等多种形式，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宣传动员，从而逐步扭转了群众的卫生观念，树立起“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新风气，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持续深入地展开。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既有符合社会宣传规律的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为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和卫生宣传教育工作提供了一定启示。

【关键词】：爱国卫生运动 宣传动员 新中国 卫生观念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675(2022)03—147—09

“爱国卫生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一场以群众运动形式展开的，带有爱国色彩的卫生活动。近年来，学界对新中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在爱国卫生运动及相关疫病防治工作中的动员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社会动员发挥了积极作用，有力推动了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达到了“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目的¹。但是，目前学界大多是从整体性角度对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进行考察，缺乏专门针对宣传动员这一社会动员主要方式的深入分析。为此，本文运用相关史料，从“宣传动员”的视角研究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集中回答为什么要开展宣传动员、怎样开展宣传动员以及宣传动员成效如何等问题，以期当代中国卫生宣传动员工作提供一个样本，推动新时代爱国卫生运动向纵深发展。

一、爱国卫生运动宣传动员的缘起

广大人民群众卫生科学知识水平的高低、卫生素质的好坏是爱国卫生运动成败的关键之一。可以说，没有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就没有高质量的群众性卫生运动，卫生工作也就不可能做好。尽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解放区进行了一系列卫生宣传教育以引导群众改变卫生习惯，但群体卫生观念与生活方式的转变不可能在一时的宣传与鼓动下得到彻底转变。新中国成立初期，许多民众的思维其实还停留在过去的陈旧状态，人们对于清洁、疾病以及健康仍缺乏足够理性的认识。毛泽东就当时的情况曾指出：“每年全国人民因为缺乏卫生知识和卫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经济上的损失，可能超过每年全国人民所受水、旱、风、虫各项灾荒所受的损失”。^[1]

民众卫生观念淡薄的直接表现就是不注重清洁卫生，尤其不注重公共卫生。虽然我国自古就有爱清洁讲卫生的优良传统，近代西学知识的传入也推动了现代卫生观念在中国萌芽，但这毕竟只限于精英阶层，对于大多数挣扎在温饱线的普通民众而言，连绵的战争、长期的穷困早已使他们对脏乱差的环境习以为常，更遑论养成合乎“现代规范”的生活习性。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之后，有群众就说：“讲卫生是穷讲究”，“扫地也扫不出粮食来，不讲卫生死不了人”。^[2]在他们眼里，生存才是首要问题，讲卫生不过是个高层次的问题，不是现实的问题，因而民众的个人卫生习惯和居住环境普遍较差。吃生冷腐败食物，喝生水，常年不洗澡、不洗衣、不晒被等不讲卫生的行为十分常见。室内环境差，公共场所或者说室外场所的环境就更不好了。许多人只顾各扫门前雪，室外周围各不相干，公共卫生意识十分淡漠。如通县很多人在胡同里倒脏东西，以致某些胡同里粪便污物遍地皆是。^[3]山西稷山县太阳村到处是砖头、瓦块、粪便、垃圾，被人们称作“穷村”“脏村”“瘟病村”。^[2]辽宁省北镇县卫生状况

作者简介：胡靖，吉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最好的广宁镇也有 5 条胡同和街道被垃圾、粪便堵死。^[4]

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东方专制制度基础的农村公社“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5]中国人缺乏卫生意识和卫生习惯与封建迷信思想密切相关。可以看到，中国民间信神不信医，求观音、拜王母的现象长时间普遍存在，“生病受苦，命里注定”“吃得蹉跎，做得菩萨”的说法一度广泛流传，民众大多缺乏卫生常识。比如关于种痘，有的群众就认为“种痘必须在春天”，不明白秋、冬种痘的好处；有的群众认为种一次保一辈子，不懂得种痘只管三五年的道理；有的不知道感染天花具有潜伏期，在此期间种痘也要出天花，因而“怕种痘引出花来”，不敢种痘；还有的看到过去种痘需用刀划得很深流出血来，对于只用针轻划不使出血的种痘新法，表示轻视拒绝。^[6]这类保守落后的思想在农村尤为明显。萧山县欢潭乡不少村民生了病，就到东坞村五仙娘娘庙烧香磕头求菩萨，弄一包香灰当药吃。^[7]1952 年山西稷山县麻疹、伤寒、流感等传染病严重流行，群众求神拜药一时成风，仅到西段村三皇洞求神拜药的在 10 天内即达 7000 余人。是年，该县仅因麻疹而死亡的即达 2300 余人，因伤寒而死亡的据上柏等 16 个村统计达 106 人。^[2]

由于卫生观念的落后，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之后并未马上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反而引起了部分人的反感。黑龙江克山县就有群众说：“生产任务重，时间不容空”，“活计忙不开，哪有时间除四害”。^[4]这类观念不仅存在普通群众，领导干部持有类似想法的也很多。有些干部把爱国卫生运动和工厂、农村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对立起来看待，认为“讲卫生好是好，就是要耽误生产”。有工厂负责人甚至不动员职工打防疫针，怕因打针引起的反应影响了生产。^[8]山西临汾专区的某些县份因只顾搞“中心工作”，将卫生科的干部全部调走。^[9]阳泉市小南坑矿的工会主席说：“工人一天劳动了八小时，再发动他们搞清洁卫生工作是增加他们的负担。”^[10]这些干部没有认识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增产节约运动的顺利开展。如果不提高工农劳动人民的健康，生产建设事业必然也会受到影响。而这类错误思想带来的就是对爱国卫生运动的消极态度。有些领导把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文件，往卫生工作人员身上一推了事；有些干部单纯依赖上级和强调客观条件不好，只是等待上级派卫生队来，等待足够的设备和经费来解决问题；还有些干部没有把卫生工作看作长期的建设任务，而抱着单纯任务观点，以为“浪头一过，万事大吉”。东北新民县人民政府人员拒绝卫生检查，声明“运动已到巩固阶段”，但最后检查的结果，却发现院中牛马粪又累积成堆了。^[8]如此种种，极大制约了爱国卫生运动的推进。

通过上述卫生观念和对清洁卫生的态度可以看出，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之初群众自觉投入大规模的清洁扫除并未马上成为主流，群众的力量实际并未完全发动起来。基于此，通过开展持续广泛的卫生宣传以帮助群众提高认识，动员人们最大限度地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为这一运动深入、持久地开展打下基础，成为非常必要和必然的事情。

二、爱国卫生运动中宣传动员的主要形式及效果

宣传动员是一种有意识地控制社会心理的活动，是改变或形成民众特殊态度、意见和舆论的重要工具。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开展卫生宣传动员，以革新民众卫生观念，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参与卫生治理。1951 年 5 月，卫生部就专门发布了《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特别要求各级政府要面对人民大众，有重点的深入的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妇幼卫生知识，纠正不卫生习惯，破除迷信。^[11]1952 年，爱国卫生运动正式兴起后，党和政府更是把做好卫生宣传视为搞好运动的关键，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采取多样化的宣教方式，进行了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宣传动员。

（一）文字宣传

文字宣传，就是用书面文章的形式表现宣传内容的宣传形式。^[12]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党充分运用报纸刊物、图书标语、板报墙报等文字形式，来加强卫生知识的普及。如 1952 年第 9 期《时事手册》就是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为中心的，其中包括“进一步做好防疫卫生工作，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常见的几种传染病”“扑灭传染疾病的‘五毒’”等文章。^[13]中华医学会总会所编写了《防御细菌战的常识》《防疫常识》等一批通俗读物。这些通俗小册子注重根据不同读者对象的特点进行编写，如《农村防疫常识》《家畜传染病防治常识》中内容通俗，并配有插图，可以帮助识字不多的农民读懂它的大意；《城市防疫常识》

以改善城市环境卫生为重点，工厂、学校、机关、商店、住户和公共场所，可参考本书内容，改善公共卫生设备；《彻底打败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扼要地叙述了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和我国境内进行细菌战的罪证，并介绍了一些防御细菌战的常识。^[14]

报纸由于发行量大、覆盖面广，是卫生宣传的主要武器和资料。当时，除《健康报》《大众医学》等卫生类专门报刊外，中央和地方党报及其他综合性报刊也大力宣传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报道卫生战线主要活动，从不同角度刊登一些医药卫生方面的文章。如《人民日报》自创刊以来，一直不间断地登载有关医药卫生方面的法律规定、工作动态、领导讲话、经验介绍、卫生知识等消息和文章。爱国卫生运动兴起之后，还在“读者来信”专栏刊登了许多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的体会感受、批评建议以及被批评者的检讨等。20世纪50年代初，天津《新晚报》开辟“讲卫生”专栏，其中有“医生的话”“疾病防治”和“就医指导”等内容。^[15]昆明《正义报》上开辟了卫生副刊《昆明卫生》，结合各个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内容及防疫工作，刊登有关卫生法令、爱国卫生运动进展情况及医药卫生知识。^[16]1952年6至9月，南京市报纸刊载卫生稿件达300多篇，平均每天3篇。^[17]据1952年上半年统计，全国公私出版的医药报刊有170多种。^[18]且随着爱国卫生运动的推进，这些卫生报刊内容的思想性、政策性也逐渐提高，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逐渐减少，一些不甚健全的期刊归于淘汰。1952年8月，为进一步改善医药卫生期刊的出版情况，卫生部和出版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调整全国医药卫生期刊出版的决定》，推动医药卫生期刊出版得到迅速发展。

除报刊图书等纸质宣传，在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还经常利用标语、板报、墙报等开展宣传动员。这类宣传在城乡随处可见，营造了浓厚的卫生科学教育氛围，收到了较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如杭州市北大树巷在动员群众治理臭水塘时，在水塘四周的住屋上挂满了“下定决心修好池塘，保护居民的身体健康”“劳动最光荣”等红布横幅标语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19]嘉兴市私营民丰造纸厂就工人认为使用公筷是“花样经”的思想情况专门出了一期黑板报进行批判，并介绍了朱维义膳食小组实行公筷制的好处，从而扭转了群众“怕麻烦”“不习惯”的思想。^[20]兰溪县万坛区樟里乡、新周乡设立爱国卫生墙报，报道各村运动的进展及挑应战情况，以此推动清洁卫生工作，使该地区爱国卫生运动得到经常性贯彻。^[21]

（二）语音宣传

语音宣传，又称口头宣传，是宣传者用生动的口语对接受宣传者起说服作用的一种宣传形式，具有快速简便、适用范围广的特点，在新中国初期交通不便、文盲众多、报纸不足的条件下，作用更大。在语音宣传中，通过会议进行宣传动员是中共常用的方法。如南京市仅于1952年6月就在各级各系统进行了卫生宣传教育大报告986次，小报告2078次，座谈会4105次，家庭访问宣讲3487次。^[17]

开展卫生科普讲座也是传播卫生知识、进行宣传动员的有效途径。1952年夏，为配合在全国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组织各地分会开展清洁卫生、防疫反细菌战的讲演。^[22]同年6月，上海市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也组织了中西医师、教授、各种专家、工程师、公共卫生工作人员、医学校学生和护士等向市民作卫生知识报告。^[23]在举办讲座前，组织者还会有计划地派人深入群众了解情况，这样不仅可以掌握群众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真实想法，还有利于在调查过程中搜集到注意卫生而增进健康的具体事例来充实教育内容。由于在讲座中进行了具体事实的教育，其效果往往也更好。很多干部、学生和居民听了讲座后，表示获得了不少卫生科学知识，懂得了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也积极投入到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活动中。

除讲座、讲演、报告会、座谈会、个别谈话等直接性语音宣传，还有通过广播等进行的间接性语音宣传。这类语音宣传打破了空间限制，辐射范围更大，效果也非常显著。如1952年6月8日晚，浙江省人民政府卫生厅、杭州市人民政府卫生局、浙江省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筹备委员会和浙江、杭州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行了“浙江省暨杭州市爱国防疫卫生广播晚会”，全省听众达10万人，在晚会进行中，各地听众纷纷打电话或写信来一致表示要以搞好爱国防疫卫生工作的实际行动来打败美国的细菌战。^[24]8月4日晚，华东人民广播电台也举行了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作了《更普及、深入、经常地展开爱国卫生运动》的报告。此次广播收听群众达150万人以上，在广播大会进行中接到了华东各地1500多次电话。^[25]由此也可看出利用广播大会进行宣传动员的显著优势，即具有较强的互动性，有利于激发听众强大的情感力量。

广播电台除举办爱国卫生运动专题大会外，还会举办一些卫生类节目。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均开设了《健康》专栏节目。^[26]天津市卫生局卫生宣传科与天津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了专题节目《李大夫的话》宣传防病知识。^[15]这些电台节目在动员群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中也起了相当作用。辽西省立锦西中学朱枫向《人民日报》写信说：“最近收听辽西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卫生讲座’，内容是讲解如何预防和扑灭细菌；我觉得这样的宣传很好。因为反细菌战是全国人民的战斗任务，每个人都应积极行动起来。”^[27]

(三) 形象宣传

形象宣传，实际上就是直观宣传，它“借助于情绪感染力，尤其是通过激发视觉感知来实现的宣传影响，其目的是使观众形成特定的社会政治思想”^[28]。形象宣传的类型非常多，包括海报、漫画、照片、绘画、展览、电影、戏剧、歌曲等，是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动员中广泛运用的一种形式。其中生动逼真的宣传画最为普及，各地出版社绘制了大批不同类型的卫生宣传画，如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了11种宣传卫生知识的挂图，11种以鼓动群众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彻底粉碎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为主题的招贴画。^[14]这些卫生宣传画一般都避免了旧的卫生读物所容易犯的那些脱离实际、高深难懂、枯燥乏味的缺点，联系了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城乡环境的实际情况，从各方面介绍了卫生科学知识，把卫生工作和反细菌战斗争的相互关系也具体地表现出来。中央卫生部门为帮助卫生挂图、招贴画能够普遍发行，还特地指定出版社降低了这些出版物的定价。

卫生展览会以实物的形式向群众传播有关人体健康的科学知识，也是新中国初期常见的形象化宣传方式。如1952年5月，北京七区组织了巡回展览，拿被老鼠损坏了的衣物、鼠疫的图片和捕鼠工具到各地进行宣传，三区并举行扑灭“五毒”展览会，交流捕鼠经验。展览会中备有显微镜及其他实物模型，民众可以通过显微镜观察害虫细菌的真相，大大提高了对害虫细菌的警惕。^[29]同年年底，卫生部还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展览会，展览会结束后，展品随即运往上海、广州、武汉、重庆、昆明、西安等地巡回展出。^[30]在教育落后和文化生活贫乏的年代里，爱国卫生展览会是人们向往的一道文化大餐，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当时仅有4万人口的小城市银川，在市中心公园举办了卫生展览，仅半天时间就有11508人参观。^[31]而爱国卫生展览会的效果也是空前的，它一方面增加了群众的卫生常识，增进了卫生意识。辽宁城镇南关街居民葛兴民看了毒虫展览会以后，马上就向展览会负责同志报告了某地发现蝇子的情况，并主动要求领着民兵去把它们消灭；城镇某居民组长看见蚊子能传染疫病的宣传画后，回去就动手填平了死水池。^[32]另一方面增进了人民群众打赢反美细菌战的信心决心。惠兴女中学生戴竹青参观了卫生展览后激动地表示：“美帝国主义者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细菌战的滔天罪行，只说明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的惨败、残暴和无耻，我决心努力学习，以做好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的宣传工作来回击美国的细菌战！”^[33]因此，可以说爱国卫生展览会是通过实例向人民进行的一次爱国主义教育与健康科学教育大课。

然而对于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而言，即便利用显微镜进行现场展示也无法理解对着镜头看得见活蹦乱跳的尾蚴，离开却什么也看不见的“奇怪”现象，致使他们认为卫生工作人员“是在变把戏、演魔术，镜下看到的怪物是变出来吓唬老百姓的”。^[34]此时，电影作为一种“最群众化的、有力量的艺术形式”，^[35]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向群众传播卫生知识的重任并发挥了重要作用。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中央卫生教育所拍摄了《预防感冒》《预防麻疹》《预防小儿腹泻》《预防白喉》《预防肝炎》《预防煤气中毒》《孩子从哪里来》《幼儿锻炼》《脊柱弯曲》《游泳安全》《农村饮水卫生》《乡村医生》《青春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灭蚊防脑炎》等一系列卫生教育电影片。^[30]1952年9月，下花园矿区电影队放映了多部卫生影片，很多人看完《妇婴卫生》后说：“要是早照这个方法接生，有些孩子也不会死了。”看完《神鬼不灵》后说：“从前有病去找跳大神的，花钱丧命，真不值！”^[36]

但是受放映条件限制，新中国初期更流行的是一种被称作“土电影”的幻灯片。当时，关于爱国卫生的幻灯片有《添丁过年》《消灭细菌战》《防治吸血病虫》《扑灭传播疫病的害虫》等。^[37]这些幻灯片都是五彩的，通过银幕上生动的形象，配合讲解员耐心、详尽地讲解，给观众很大的教育。住在杭州钱王寺前十二号的叶大妈就说：“过去，我们一家人饭前从来不洗手。看了这次幻灯片，我想想一双手时常东摸西抓，实在不干净；再说，洗手又不是麻烦的事，我们一定要慢慢养成饭前洗手的好习惯。”^[38]

此外，各剧种、曲种以及民间流行的快板、相声、皮影戏、木偶戏等文艺节目，都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卫生宣传教育形式。当时，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创作了大量卫生相关文艺作品，如话剧《龙须沟》，快板《消灭苍蝇》《预防煤气中毒》、山东快书《卫生模范列车》、顺口溜《红旗保健站》等。很多地方以俱乐部为阵地，以业余剧团为骨干，组织各种文艺宣传队、演出队、秧歌队、歌唱队，采用这些文艺作品进行卫生宣传。而由于这类宣传更具娱乐性和直观性，最受群众喜爱，也更易产生宣传效果。

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爱国卫生运动开展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卫生科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和卫生政策思想的教育工作，推动了我国群众性卫生宣传事业蓬勃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50—1953年，全国共出版卫生宣传通俗小册子及画刊约4000万册，挂图和招贴画约4500万份；用黑板报宣传143000多次；组织讲演会754000多次，听众达4070万人；举办展览会13700多次；放映幻灯43400多册，观众达1200多万人。^[18]其宣传力度之大、覆盖面之广，是以往任何卫生运动中的宣传动员所无法比拟的。

心理学认为，同类信息的多次刺激，会使对象产生心理定式，从而产生相应的态度。^[28]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各种形式的反复的卫生宣传，造了声势、发动了群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群众的卫生观念，“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社会风尚逐渐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具体体现在：一是居民个人卫生状况和公共环境卫生大为改进。人们逐渐养成了勤洗手、勤晒、勤扫，不喝生水、不吃生芽生肉、不随地吐痰便溺等良好个人卫生习惯。各地群众还自动地组织爱国卫生互助组，互相督促检查，进行卫生工作。在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原来的“臭窝窝”变成了清洁院，街道、机关、学校、工厂、营房的卫生环境也大有改进。二是有了一定的卫生知识，群众的思想得到极大解放。广东省揭阳县群众拆了神龛改做垃圾箱，江西省吉安市群众撕毁了“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许多地区农民不再相信“开窗户会坏风水走钱财”的说法，都开了新窗子。^[18]破除了保守迷信思想，人们对疫苗接种等现代防疫手段也不再排斥。华东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听了种痘宣传之后，当场要求种痘。^[39]安徽省1952年春季种痘人数超过反动统治时代全国种痘最高纪录的50%，该省在这一年接种卡介苗的人数为1937至1948年11年间全国接种人数的4倍多。^[40]三是消除了爱国卫生运动偏见，形成了“生产讲卫生，卫生促生产”的良好建设氛围。在宣传动员中，党和政府注意激发全体群众的卫生清洁热情，并将之与参加国家建设的实际行动有机结合，推动爱国卫生工作与生产建设事业良性互动，从而使那些“卫生与生产有矛盾”的错误观念不攻自破。余杭县农民俞建河看了笕桥区爱国卫生运动搞得好后说：“我们过去对爱国卫生运动太不重视，认为搞卫生与生产冲突。这次看了笕桥区的榜样，才知道生产和卫生运动是完全一致的，人生病还搞什么生产，我们回去一定要动员大家学习笕桥区农民兄弟的好榜样。”^[41]

三、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宣传动员的历史经验

在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党和政府广泛地进行了爱国主义和反细菌战防疫知识的宣传教育，消灭“五毒”，讲究卫生，在全国广大地区家喻户晓，使爱国卫生运动真正成为一项移风易俗的运动。这一时期的卫生宣传，从内容选择、方法运用和依靠的主体上，都展现了一定的动员艺术，可为新时代爱国卫生宣传动员提供重要借鉴。

（一）结合群众健康需要和爱国主义情感实施动员

满足特定的需要是任何个体投身于政治参与过程最深刻的心理背景，而只有当这种参与实践满足了参与者特定的心理需要时，才能更大的激发起主体的参与热情，强化其政治参与的动机。^[28]在个体多样化的需要中，健康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个人最大的追求。在爱国卫生运动中，领导者始终关注群众内在健康需要，宣传内容也以卫生知识为主，涵盖卫生防疫行为、个人卫生习惯、日常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1952年4月，中央卫生部宣传处特别拟就了《防疫常识宣传提要》，其内容为最基本的防疫科学知识。^[42]在此过程中，党和政府还采用了多种群众参与度较高的宣传形式，让人们从爱清洁、讲卫生、信医药的新风气中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进而增强卫生意识与行动。如在卫生竞赛中，模范卫生个人、模范卫生单位、模范卫生村不断涌现，群众从中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讲卫生对于健康的重要性。沈阳铁西区太阳里家家讲卫生，解放后小孩没有得过麻疹、天花等传染病，大人也没有一个得过严重疾病；^[43]西北军区汽车某团驻地从肮脏变清洁，全团发病率大大减少；^[44]锦州市积极清垃圾、挪粪场、填臭水沟，1952年1至7月全市患传染病人数比去年少4倍多，害痢疾病人数比去年少10倍多^[45]……这些活生生的事

例逐渐使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了不讲卫生的不良习惯，并开始自觉自愿投入爱国卫生运动之中。

爱国卫生运动兴起的直接目的是为反对美国对华细菌战。彼时，中国刚刚结束长期以来内忧外患频生的历史，实现民族独立，美帝国主义却在此时在我国东北、山东等地投放各种有毒昆虫，妄图用罪恶的细菌战争来伤害中国人民，引起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加紧把美国鬼子撵出去”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愿望。此时，党和政府及时且巧妙地利用了群众的这种爱国主义情绪，把卫生宣传和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结合起来，以推进卫生工作。1952年4月，政府在《关于两个月来反细菌战工作的总结报告》中就提出，防疫工作“总的要求是，不仅在反细菌战上我们一定要取得胜利，而且要经过此次防疫运动，将我们的卫生工作提高一步，以便在更好的卫生工作基础上对付敌人可能继续施用的暴行”。^[46]随后，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诉苦、讲真人真事等一系列动员活动，以响应毛泽东“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争”^[47]的号召。通过这些宣传动员，群众深刻懂得了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保障人民身体健康所必需，也是反击美国侵略者细菌战的实际行动。总之，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建立在群众政治觉悟的基础上，这就使其中的宣传动员不仅是卫生知识的普及，也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教育；不仅改变了群众的卫生观念，也增进了对新生政权的政治认同。

（二）采取学习、宣传和行动相结合的方法

新中国初期，报纸是最主要的大众传媒，但当时条件下，大部分村庄只有少数干部或几个识字的人每天看报，广大的群众很难接触到报纸，于是便出现了集中读报的读报组，负责将主流媒体的最新消息摘抄下来，以便群众获取信息和相互学习。如北京第六文化馆组织全街52个读报组着重学习有关反细菌战的材料，广泛地向群众揭发美帝国主义撒布细菌的滔天罪行。^[48]这些读报组的建立和活动，使得大家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领会爱国卫生运动的新动向，有力提高了读报群众的卫生意识，推动了爱国卫生运动的发展；而且当读报组组员在读了报懂得道理后，还根据报纸上的新材料广泛地对没有参加读报的群众进行爱国卫生宣传教育，进一步扩大了宣传效果。在此过程中，这些读报员也非常注重方式方法，并不是照报逐字逐句读，而是由读报员首先学习研读报纸，然后根据不同对象选择合适的文章，边读边讲，对文化程度很低的群众甚至只讲不读。许多党的宣传员参加读报、担任读报组长或读报员，不仅进一步增进了自己的知识，丰富了宣传内容，加强了和群众的联系，更加活跃了党的宣传网的工作。

在宣传动员中，如果光说不做，会使宣传变成空谈；光做不谈，会造成工作中强迫命令的现象。在爱国卫生运动中，各地的宣传人员不仅大力宣传卫生知识，还坚持学习、宣传与行动相结合，身体力行和广大群众一起参与到爱国卫生实践中去。如稷山县以县卫生工作者协会为核心，组织巡回医疗队，一面治病，一面开展卫生宣传工作，使群众初步体会到讲卫生可以预防疾病的好处，提高了卫生自觉。^[2]南京市动员参加卫生训练的大学教师、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以及卫生行业从业员，一边学一边向群众进行宣传。广大的宣传队伍，随身带着扫帚和捕蝇灭蛆工具，一面进行宣传，一面进行检查；宣传到那里，就在那里打扫捕蝇，检查卫生情况，从而消灭了卫生工作中的“死角”，同时改变了某些群众对干部“只动嘴不动手”的看法。^[49]可以看到，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宣传动员，不仅采取读报组等方式不断向群众进行“讲道理”的教育，还带领群众、帮助群众去做，从而使宣传格外有力量。

（三）发挥多方面合力，推动卫生宣传深入基层空间

新中国初期，为完成卫生宣传教育的任务，从卫生部到各级卫生行政业务部门，都规划了卫生宣教组织的编制，但卫生宣传工作决非卫生机关和卫生工作人员所能单独胜任的，只有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把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都组织起来，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为此，党和政府充分发动爱国卫生运动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建立起一支庞大的卫生宣教队伍。如南京市一市就有15万人以上的宣传队伍，青岛市曾以宣传员及科学技术工作者、医务工作者为核心组成了10万人的爱国卫生宣传队，山东省平原县一县就组成了8万多人的宣传队伍。^[18]

当然，光有人员数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于是党和政府又大规模地对积极分子进行了卫生常识教育。教

育的方式一般是采取业余训练和短期训练班两种形式。在农村，还将卫生防疫常识列为民校的课程，安排医务工作人员下乡利用晚上分点讲授。这些接受了培训的宣传员再深入至群众日常居处的街巷、小组乃至村头、家户之中，进行宣传、劝导和检查，这就使爱国卫生运动做到了前所未有地普遍深入的程度。如湖北荆州专区钟祥县就动员妇联、学校、文化馆、剧团，以卫生院防疫人员、学生、演员、卫协会会员、党委宣传委员为主力，开展卫生宣教活动，对讲卫生和不讲卫生的典型人和事，编成短剧或画漫画进行表扬与批评；京山县卫生院与县政府文教科、文化馆、文工队、工会等单位结合，利用干部开会和群众上街的机会，放幻灯，出黑板报，贴卫生图画，组织腰鼓队上街，演唱快板词；江陵县不仅安排医务人员与组宣科人员在荆江大堤工程工地，张贴卫生标语、漫画、编发卫生打歌歌词，在民工休息时口头宣传卫生常识，还组织卫生宣传队伍，划区包干，挨门逐户讲解。^[50]至 1953 年，全国受到了爱国卫生教育的城市居民平均在 80%以上，乡村居民也在 60%左右。全国卫生模范城市山海关是在这一方面更有突出的成就，该市东街居民平均每人受到 80 至 100 次的爱国卫生教育。^[18]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有组织的经常起作用的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党的卫生宣传才逐渐克服过去存在着的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缺点，迅速发展起来，这是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能够收获空前效果的最重要的原因。

四、结语

1952 年国际科学委员会在考察了北京市和我国东北的卫生措施和卫生教育后，向世界宣告：今天在中国正在进行着一个伟大的运动，在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卫生。这个运动是受五万万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的，这样规模的卫生运动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这个运动已经发生了作用，使得由于传染疾病而引起的死亡率和发病率大为减低了。在我们看来，试想用细菌战消灭这样一个民族不仅是犯罪的，而且也是徒然的。^[51]新中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有效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的阴谋，提高了我国卫生工作水平，加速了我国卫生事业的建设。

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的顺利推进，宣传动员起了巨大作用。但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爱国卫生宣传教育依然存在一定的缺憾和不足。如宣传中信息传递的自上而下的单向性明显，而不是上下联动、广泛商谈的渗透过程；宣传活动多样，但存在形式化，有的地区因过分重视居民小组会、干部会、职工会等宣传方式。不过从整体上看，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宣传动员还是很有特点的，也是很高效的。它不仅使城乡各地呈现清洁卫生的新气象，而且推动了群众卫生观念的变革，为下一阶段开展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也为今天新时代进一步发挥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优势，普及卫生健康知识，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留下宝贵历史财富。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 6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76.

[2]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资料汇编[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24, 22, 18, 18.

[3]本报读者来信批评某些地区有忽视爱国卫生运动的现象[N].人民日报，1952-08-13(6).

[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资料汇编：第 2 部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0:5, 12.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53-854.

[6]智力樵.农村群众对种痘的看法[N].人民日报，1950-1-24(5).

-
- [7]浙江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 浙江人民出版社. 爱国卫生运动在欢潭乡[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3:3-4.
- [8]纠正忽视爱国卫生运动的现象[N]. 人民日报, 1952-06-29(4).
- [9]克服爱国卫生运动中的松劲现象[N]. 人民日报, 1952-11-04(3).
- [10]梁秀. 山西阳泉市的领导干部应改正对爱国卫生运动的看法[N]. 人民日报, 1952-8-24(4).
- [11]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 关于卫生宣传工作的指示[J]. 上海卫生, 1951, 01(8):74-75.
- [12]向在仁. 宣传学概论[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8:121.
- [13]文化简讯[N]. 人民日报, 1952-05-10(3).
- [14]周静. 介绍几种宣传卫生常识的挂图、招贴画和通俗读物[N]. 人民日报, 1952-06-29(4).
- [15]本书编委会. 天津市志·爱国卫生运动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2017:46, 42.
- [16]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昆明市志: 第9分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810.
- [17]南京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办公室. 南京爱国卫生运动志[M]. 北京: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1991:105, 105.
- [18]张学文. 新中国的卫生事业[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3:52, 51, 51, 52, 52.
- [19]彭汝春. 臭水塘变成活水塘[N]. 浙江日报, 1952-09-09(3).
- [20]推动了全厂的爱国卫生运动[N]. 浙江日报, 1952-07-19(3).
- [21]结合生产搞好爱国卫生运动[N]. 浙江日报, 1952-07-18(3).
- [22]梁希. 把科学技术知识带到群众中去[N]. 人民日报, 1952-08-25(3).
- [23]文化简讯[N]. 人民日报, 1952-07-12(3).
- [24]联合举行爱国防疫卫生广播晚会[N]. 浙江日报, 1952-06-20(3).
- [25]华东举行全区爱国卫生运动广播大会[N]. 人民日报, 1952-08-08(1).
- [26]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志·卫生卷·卫生志[M].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3:191.
- [27]来信摘要[N]. 人民日报, 1952-04-22(6).
- [28]蒋云根. 政治人的心理世界[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115, 37, 62.

-
- [29]金凤.北京市开展爱国防疫卫生工作的经验[N].人民日报,1952-05-18(4).
- [30]张殿宇.北京卫生史料(1949~1990)卫生防疫篇[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398,402.
- [31]《宁夏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宁夏卫生志[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178.
- [32]王庆祥.辽东抚松县举办卫生展览会提高农民的卫生知识水平[N].人民日报,1952-09-10(2).
- [33]爱国防疫卫生展览会圆满结束[N].浙江日报,1952-06-08(3).
- [34]江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送瘟神纪实[M].内部刊物,1992:132-133.
- [35]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四九年十月~一九六六年五月):第15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69.
- [36]祝平.《妇婴卫生》《神鬼不灵》等影片发挥了很大教育作用[N].人民日报,1952-09-21(2).
- [37]文化简讯[N].人民日报,1952-07-26(3).
- [38]徐汉波.一个进行卫生宣传的流动幻灯放映队[N].浙江日报,1953-08-23(3).
- [39]陈致明.起了移风易俗作用的爱国卫生运动[N].人民日报,1952-12-05(3).
- [40]安徽省卫生志编纂委员会.安徽卫生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3:613-614.
- [41]内容丰富很受欢迎参观者已有三万多人[N].浙江日报,1952-09-25(3).
- [42]中央卫生部宣传处.防疫常识宣传提要[J].医务生活,1952(6):33-35.
- [43]思真.沈阳市的一个居民卫生模范组:太阳里[N].人民日报,1952-06-15(4).
- [44]谢世良.西北军区的一个卫生工作模范团[N].人民日报,1952-08-31(4).
- [45]革路.锦州市的一条卫生模范街[N].人民日报,1952-09-07(3).
- [4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233.
- [47]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628.
- [48]金竞.北京第六文化馆发动读报组进行卫生防疫宣传[N].人民日报,1952-04-02(6).
- [49]吕健军.南京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N].人民日报,1952-12-13(3).
- [50]湖北省荆州地区行政公署卫生局.荆州卫生志[M].内部刊物,1991:133-134.

[51]新中国保健事业和卫生运动之备忘录[N].人民日报,1952-09-19(3).

注释:

1 相关代表性成果可参阅高中伟、曾菊:《新中国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群众动员》,《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张慧卿:《全民动员:南京市解放初期的卫生防疫》,《当代中国史研究》2021年第2期;高中伟、段文健:《新中国初期中共对血吸虫病防治的社会动员》,《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2期;邓智旺:《新中国成立初期爱国卫生运动中的社会动员》,《兰台世界》2011年第29期,等等。